

隋唐考古

冉万里◎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集团

隋唐考古是

的历史考古学。

时期不仅政治统

与遗物数量多、

兴唐长安城遗址

器、各类棚棚如

异域遗物等。通

解，可以触摸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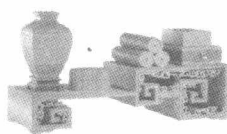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典型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下启宋元。这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而且各类遗迹丰富多彩。如遗址类有世人注目的隋大等；遗物类有色彩绚烂的三彩器、金银生的造像以及反映『丝绸之路』繁荣的过学习，可以加深对『汉唐雄风』的理唐文化的脉搏。

隋唐考古

SUITANG KAO GU

冉万里◎编著

陕西
人民出版
社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考古 / 冉万里编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135-9

I. ①随… II. ①冉… III. ①文物—考古—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K8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900 号

隋唐考古

编 著 者 冉万里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彩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6.7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40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9135-9
定 价 30.00 元

前言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迹与遗物,而且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开展,新的发现层出不穷。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考古学成为一门研究古老学问的年轻学科,也是一门魅力无穷的学科。同时它也常常是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的关键,正如郭沫若所说:“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①王国维也曾经说:“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②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不断涌现的新发现,也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也是永远年轻的学科。

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隋唐考古学,首先是中国考古学按照朝代划分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分支,不仅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而且是典型的历史考古学。它所研究的对象不仅仍然是遗迹和遗物,还有其自身的研究特点。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数量巨大,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揭示当时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同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问题,既是历史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色。因为像中国这样,古籍如汗牛充栋的国家,世界上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如何让这一特色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所承认,则是值得不断探讨的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历史考古学的定义:历史考古学是从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而言的,属于考古学的两大分支之一,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与史前考古学的界限在于文字的发明。世界各地,文字的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② 王国维:《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③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1930年;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发明有早有晚,所以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和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年代上各有不同。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一样,也是以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历史考古学必须参考文献记录,同时还需要结合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代建筑学等,只有这样才能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讲,历史考古学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这和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技术有一定区别。隋唐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从隋王朝建立到后周灭亡(581—960),包括隋、唐、五代十国。

从隋唐考古学的研究历史来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等国即派遣所谓的探险队,先后进入我国的新疆、甘肃等地,挖掘墓葬、调查古城遗址和石窟寺,掠走大批隋唐时期的文书、壁画、绢画和其他文物。1900年以后,在新疆及近邻地区进行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国的格林威德尔、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科兹洛夫、奥尔登堡等。他们发掘的和隋唐有关的地点有: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墓群;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城址。他们从这些遗址盗掘并窃取了大量唐代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1906—1910年,日本人足立喜六受聘于陕西高等学堂(今西北大学前身),他利用授课之闲,曾部分地实测了长安城遗址,调查了关中唐十八陵,写了《长安史迹考》^①一书。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又大规模挖掘了渤海上京龙泉府等遗址——东京城。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安藤更生还对扬州城址进行了调查。

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者也对隋唐时期的考古工作有一定贡献。1927年,中国、瑞典共同组织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授徐旭生担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任瑞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到新疆从事考古工作。其间,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遗址及高昌墓地等,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了汉唐时期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等。袁复礼在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了唐北庭都护府城址。1929年,在发掘安阳殷墟的同时,还清理了175座隋唐墓葬。1939—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① [日]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言研究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在云南大理附近调查发掘了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来,又与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合作,由冯汉骥、刘复章等于1942年在四川成都发掘了五代前蜀王建墓,并于1964年出版了发掘报告。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在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率领下,根据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唐代木建筑佛光寺大殿。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单位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者向达、夏鼐和阎文儒3人在武威附近发掘了唐代吐谷浑墓葬,在敦煌老爷庙发掘了两座唐墓^①。这些早期的隋唐时期的调查和发掘,对以往的古不考三代(夏商周)以下的思想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与现代考古学相映生辉的传统金石学也有一定发展,特别是隋唐墓志的收藏与研究,格外引人注目。清末民初,罗振玉为隋唐墓志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他以在北京古董店购买到的墓志拓片为基础,四处访求,并亲自到河南一带访拓。而后,将自己收藏的拓片一一加以录文,陆续编辑成书,刊刻出版。有关著录就有:《芒洛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山左^②冢墓遗文》、《邙下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吴中冢墓遗文》、《高昌砖录》等。这些著录主要收集了西安、洛阳、襄阳、邙城、扬州等地出土的墓志,其中主要是隋唐时期的墓志。此外,他还编辑了《蒿里^③遗文目录》、《蒿里遗文目录续补》、《墓志征存目录》等,在墓志收集整理方面建功最著。其中《墓志征存目录》(后由其子罗福颐整理成书)一书共收入隋代墓志目录202件,唐代墓志目录3083件。1924年,于右任收集到晋至宋时期的墓志三百方,其中有150方唐代墓志,1930年编写成《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20世纪30年代,张钫开始收集唐代墓志,仅5年时间就获得1000多方志石,以后又陆续收集到约2000方,并在河南新安私邸的花园内建造了砖券窑洞,将陆续所收集到墓志镶嵌在壁间,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其题名“千唐志斋”。1935年,由郭玉堂整理成《千唐志斋藏石目录》。同时,河南省博物馆收集的志石也达千余方,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私人藏志石目录也相继出版。1941年,郭玉堂又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对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的地点、时间

①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② 山左,山东省旧时的别称,因在太行山之左(东)而得名。

③ 蒿里,古人认为人死后魂魄聚居的地方。



进行了详细记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和配合新中国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三家联合,先后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考古工作者,其中就包括大批研究隋唐考古学的学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首次对隋唐考古进行了简要的综合论述,这标志着隋唐考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则更进一步丰富了隋唐考古的内容。此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86)中,隋唐考古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近几十年来,与隋唐考古相关的各类考古报告也层出不穷,已经突破了以往以城址和墓葬研究为主的局面。为配合基本建设所发掘的墓葬和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出版的隋唐时期的报告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有《唐长安大明宫》(1959)、《西安郊区隋唐墓》(1966)、《唐长安城郊隋唐墓》(1980)等。进入21世纪,唐长安城及其他地区发现、发掘的王公贵族墓葬,多以单独的考古发掘报告的形式出版,形成了近年来隋唐考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其代表性的报告有《唐金乡县主墓》(2000)、《唐代薛徽墓发掘报告》(2000)、《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2004)、《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2004)、《唐李宪墓发掘报告》(2005)、《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2005)等。而《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96)、《偃师杏园唐墓》(2001)、《陕西凤翔隋唐墓》(2008)则提供了三处墓群的埋葬情况。这些为深入研究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华清宫》(1998)则为研究唐代离宫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隋唐考古学,也需要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创新。近几十年来,前辈学者们进行了艰苦而有成效的探索。以宿白先生为代表,创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①,而隋唐则是中国古代石窟寺开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隋唐考古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

^① 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

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另外,隋唐考古学的理论探索还包括如何将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完美结合的问题。历史考古学在分区的研究方面,相对于史前时期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近年来,徐苹芳先生撰文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分区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皆有所不同;在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时,一定要考虑当时人对地理分区的意见;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建立,全国一统的因素大大加强,它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内涵丰富,在文化分区方面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分区上,民族的移动,因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迁徙,都对不同地区文化上的差异产生了影响。^① 这一论文对于隋唐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此前,权奎山在对南方地区隋唐墓葬进行分区和分期研究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墓葬的分区与当时的行政区化的关系。这些理论探索和实践,都对隋唐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丝绸之路”经过汉魏晋时期的发展,隋唐时期空前繁荣,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在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域外遗物或域外色彩浓厚的遗物数量巨大,如数以千计的各类外来金银货币,陶俑中的胡俑,金银器中的高足杯、多曲长杯,长沙窑瓷器上所装饰的卷发外国女郎、装饰阿拉伯文字的扁壶,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人面铜壶等,无不洋溢着“丝绸之路”的光辉。这是隋唐社会的国际色彩所决定的,也正是隋唐文化的魅力所在。但是,由于隋唐时期的考古发掘中,经常会出土一些精美文物,对这些文物的研究不但必要而且必需,但“脱离实际,脱离历史,将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本身的欣赏、鉴定和考据”,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夏鼐语)^②。

隋唐考古学的研究中也存在许多应当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与其他历史考古学中存在的问题相似。在“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精品战略研讨会”上,学者们指出:目前汉唐宋元考古学中,两汉和唐代考古工作开展较多,宋辽金元明考古学比较薄弱。从总体上看,汉唐宋元考古发掘和研究缺乏统筹规划和宏观

^①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② 《夏鼐先生传略》,《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控制,薄弱环节和缺环较多;在发掘中有重墓葬轻遗址,重大墓轻小墓,或碰到什么挖什么的倾向,随意性大,学术目的性不够明确;在研究方面,对汉唐宋元考古学课题构成、学科生长点、前沿课题、主攻方向缺乏共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广度和力度不够;学科基本建设薄弱,至今尚未建立主要遗迹与遗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和其他时期考古学一样,资料整理、编写和出版滞后,经费短缺,人才断层,科技手段落后或缺门。针对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汉唐宋元考古学应当加强都城和城址考古、手工业遗址及其产品、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制度、中外比较和中外交流考古学以及边疆考古学的研究。特别是墓葬研究方面,应当加强墓葬分区、分期和类型研究,从而建立墓葬形制和主要遗物组合以及形制的发展演变序列。这些看法不仅为隋唐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应当在学习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教材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编写而成的。其编写宗旨是从讲述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入手,尽量吸收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新的考古发现资料,使得该教材的使用者,能够通过学习,对隋唐考古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同时也能借助此书展开自主学习。



目 录

第一编 重要遗址

第一章 城 址	(2)
第一节 隋唐城址的类型与布局	(2)
第二节 重要城址	(6)
第二章 离宫遗址	(61)
第一节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	(61)
第二节 唐华清宫遗址	(65)
第三章 其他重要遗址	(68)
第一节 三门峡栈道遗迹	(68)
第二节 钱氏捍海塘遗址	(70)
第三节 桥梁及其遗址	(73)
第四节 矿冶遗址	(76)

第二编 陵 墓

第一章 帝 陵	(80)
第一节 隋代帝陵	(80)
第二节 唐代帝陵	(81)
第三节 五代陵墓	(99)
第二章 墓 葬	(113)
第一节 隋代墓葬	(113)
第二节 唐代墓葬	(126)
第三节 五代十国墓葬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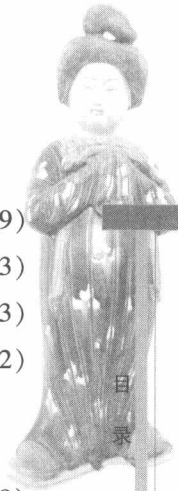


第三编 手工业遗址和重要遗物

第一章 瓷窑遗址和瓷器	(188)
第一节 瓷窑与瓷器概况	(188)
第二节 隋代瓷窑	(189)
第三节 唐代南方瓷窑系统	(191)
第四节 唐代北方瓷窑系统	(203)
第五节 其他瓷器	(216)
第六节 隋唐五代瓷器的外销	(220)
第二章 重要遗物	(222)
第一节 铜器	(222)
第二节 铜镜	(229)
第三节 铁器	(245)
第四节 金银器	(248)
第五节 玺印	(252)
第六节 漆器	(257)
第七节 玻璃器	(261)
第八节 丝织与印染	(262)
第九节 唐三彩	(265)
第十节 货币与度量衡	(273)
第十一节 建筑材料	(279)
第十二节 其他遗物	(284)

第四编 宗教遗迹与遗物及其他

第一章 佛教遗迹与遗物	(290)
第一节 石窟寺考古学	(290)
第二节 寺院布局	(308)
第三节 佛塔与塔基地宫	(311)
第四节 佛寺大殿与遗物	(315)



第二章 道教遗迹与遗物	(329)
第三章 敦煌学与吐鲁番文书	(333)
第一节 藏经洞和敦煌学	(333)
第二节 吐鲁番文书	(342)

第五编 周边地区的考古学遗存

第一章 渤海遗迹与遗物	(348)
第一节 渤海城址及其他	(348)
第二节 渤海墓葬	(356)
第二章 南诏遗迹与遗物	(360)
第一节 南诏重要遗址	(360)
第二节 南诏墓葬、石窟与遗物	(363)
第三章 吐蕃遗迹与遗物	(366)
第一节 吐蕃赞普墓	(366)
第二节 吐蕃墓葬	(368)
第三节 重要遗物及其他	(370)

第六编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和遗物

第一节 外来宗教的遗迹与遗物	(377)
第二节 外来货币的发现与研究	(387)
第三节 外来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	(393)
第四节 波斯釉陶器、西方金银器及铜器等的发现	(398)
第五节 语言文字资料	(402)
第六节 外来移民的墓葬及墓志	(403)
第七节 国外发现的受隋唐文化影响的遗迹与遗物	(408)
后 记	(416)

第一编 重要遗址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世人常以“汉唐雄风”名之。这一时期的各类遗址，因其规模宏大而让人流连忘返。其中重要的有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东都洛阳城遗址，以及作为离宫的隋仁寿唐九成宫遗址、华清宫遗址等，还有矿冶、桥梁、防洪等设施的遗址。



第一章

城 址

2

城址是隋唐考古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已发现的隋唐城址近 20 余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代表当时设计思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以下简称长安城)、隋唐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扬州城遗址。其他城址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主要有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交河故城遗址和高昌故城遗址、唐沙州城和寿昌城(二城皆在甘肃敦煌县)、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唐单于都护府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隋唐胜州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唐天德军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阿拉奔乡北古城)、隋大同城(天德军城西南约 2 公里)、唐丰州城(天德军城西南约 30 公里)等。此外,根据当地出土墓志及实地调查推断,辽宁朝阳即唐营州之所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红柳河上大弯沟以西的城川古城,可能即唐宥州城。在华清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也对唐昭应县城(今西安市临潼区)进行了调查与发掘。一般的都城、州府城的城墙夯土筑成,最近在江西南昌发现了唐代砖筑的城墙,在江西高安也发现了一段外表包砖的夯筑城墙^①。这些发现,为认识唐代城墙的建筑方式增添了新资料。

第一节 隋唐城址的类型与布局

隋唐城市的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以来都市建设的传统,基本属于封闭式的封建城市,其布局的共同特点是将居民、市全部局限在四周设置有深沟高墙的里坊之内。据宿白先生研究,隋唐时期城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都

^① 彭适凡:《江西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城；一类为地方城市^①。

一、都城

隋唐时期都城又可分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长安城。它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大兴，入唐改为长安。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36.7公里。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宫城、皇城以外为里坊区，由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格局，其间布列110坊及东西两市。整体设计思想以宫城、皇城正南门、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结构严谨，规划整齐。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思想。7世纪以后相继于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长安城的里坊多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设置十字街的坊，坊内被划分为四大区，每个大区之内再以小十字街分割为四个小区，全坊合计16个小区。通过对永宁坊遗址的发掘，证实这种十六小区布局的坊确实是存在的。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周围也筑有高墙。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

隋唐都城的第二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其地位仅次于长安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长安有所不同。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7.5公里。其宫城、皇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皇城前临洛河，后接宫城。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有前后重叠的二小城。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之端门通往郭城之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虽然也是棋盘式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市场位置也与长安城那样的左右对称有所区别，在城东部洛河两侧设

^①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南、北二市,在城西南布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阳城将其皇城和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长安,表明其规格逊于长安一等。而宫城、皇城地处全城最高处,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护卫,远比长安戒备严密;里坊沿用北魏旧制,面积小于长安,有助于强化对居民的控制,这与它既是都城又是战略要地的地位相适应。洛阳城比长安城规模小,却多设一市,并皆傍河渠,说明在设计上比长安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

二、地方城

隋唐时期的大多数地方城市布局,都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部署的,不论是较大的州城还是较小的县城都是如此。封闭式城市规划的长期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具体体现,这种城市规划到唐代达到了顶点。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从唐代晚期开始,传统坊市制度的藩篱已逐渐被突破。到宋代,为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开放式封建城市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平面布局的又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在已知的隋唐地方城址中,按照其规模的大小,又可以划分为大型州府城、一般州府城和小型州府城及县城。这类地方城市的布局基本相同,都以十字街分成四区后,每区又设十字街。

1. 大型州府城

这种城的平面布局呈方形,城内设置 16 个坊。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唐代幽州城址即是一例。唐武德七年(624)于幽州设置大都督府,九年(626)改都督府,开元十三年(725)又改为大都督府。唐亡之后,幽州于 936 年成为契丹辖地,并于此建立南京,其布局因袭唐幽州城而未加以改变。1150 年,金扩展其东、西、南三面建中都。金中都遗址已经勘察清楚。在金中都范围之内,可以看到两种街道布局,即里坊式和长巷式,后者分布在前者的东、西、南三面,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布局是后来扩展的。唐幽州为十六坊的面积。法源寺所在的坊,由大小十字街道分割成 16 个小区,其布局尚大体存在。西南一隅是州治所在,也即辽南京宫城所在。十六坊周长近 10 公里,是当时大型的州城。

另外一个例子是四川成都城。唐武德元年(618)改蜀郡为益州,龙朔二年(662)于此设置大都督府。至德二年(757)置南京于此,上元元年(760)罢京,置成都府。唐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曾于756—757年居于成都。后来,唐僖宗为了躲避黄巢起义之难,又居成都达四年之久(881—885)。这两次避难,均以官署为宫,其位置在府城西北隅的高地上。唐城东半部八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坊由大小十字街道划分成16个小区。西半部的北部,唐时是宫殿和地方衙署所在地。成都旧城内的唐城遗迹,说明即使到了盛唐时期,在地方城中置宫,其方位还沿袭旧制,选在所在城的西北隅,或是地方衙署所在地,因此,可以推知在西北隅设置衙署应当是地方城制。成都是大都督府所在地,其面积相当于16个坊,是唐代的大型州城。

2. 一般州府城

一般州府城约占四个坊的面积,也有大小之别。大的周长6.5公里,小的周长4.5公里,平面都呈方形。城的四面各开一门,内以十字街道分割成四个坊。周长6.5公里的城址,坊的面积大于0.5平方公里;周长4.5公里的城址,坊的面积大约是0.5平方公里。现在的山西大同,北魏时期曾为都城,称为平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仍是北方重镇,六镇起义时遭到严重破坏,其后因为战乱而多有废置,直到唐开元二十年(732)重建云州,置下都督府。云州城在辽金时因设西京而未改形制,明代初年就土城砌筑砖石,实际范围也没有大的改变,至今仍为大同市区内的旧城部分。经过实测,大同旧城东西长1750米、南北宽1810米,平面基本呈方形。旧城主要街道是十字街式,将全城划分为四个区,每区的面积比唐代0.5平方公里的标准坊要大。横街北面西部的区块在明清时期是府衙、总镇署所在地,应当是沿用了前代衙署的旧城。明初在横街北面东部的区内兴建了藩王府。横街以南的两个区内各置十字街道的情况非常清楚,其中东南部又由小十字街道分割成4个小区,还可以进一步在个别小区中看到设有更小的十字街道的情况。整个大同旧城发现了四层十字街道,因此可以推测这是唐代旧城的延续,即云州城遗留下来的街区痕迹。这个现象很重要,它明确地反映了唐代地方城市的规划布局也是采用大小十字街道的区划法。最小的十字街道分割成的小方块,可能就是当时城内的最小居住单位。